

# 孙中山《实业计划》对印刷工业的论述及其影响

——以民国时期印刷杂志对“总理遗教”的阐释为中心

于翠玲

**摘要:**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将印刷工业列入民生计划。印刷出版界专家通过对“总理遗教”的阐释,反复强调印刷工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反思中国近代印刷工业落后于欧美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回顾孙中山对印刷工业的论述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中国现代印刷文化研究有借鉴价值,对当今的媒介产业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实业计划;印刷工业;印刷文化;媒介史

**中图分类号:**K26;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2-0114-0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于翠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孙中山在1916年以英文撰写的《实业计划》被译为中文后,在报刊登载,广为传播。《实业计划》列出六种计划,其中第五计划属于民生计划,孙中山指出:“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吾故定此种计划如下:一粮食工业。二衣服工业。三居室工业。四行动工业。五印刷工业。”有关印刷工业的具体表述是:

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甚迟缓。吾所定国际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印刷工业。若中国依予实业计划发达,则四万万人民所需印刷物必甚多。须于一切大城乡中设立大

印刷所,印刷一切自报纸以至百科全书。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售出,以应中国公众之所需。一切书市,由一公设机关管理,结果乃廉。欲印刷事业低廉,尚须同时设立其他辅助工业。其最重要者为纸工业。现今中国报纸所用纸张,皆自外国输入。中国所有制纸原料不少,如西北部之天然森林,扬子江附近之芦苇,皆可制为最良之纸料。除纸工场之外,如墨胶工场、印模工场、印刷机工场等,皆须次第设立,归中央管理,产出印刷工业所需诸物。<sup>①</sup>

由于“袁世凯帝制失败,继以军阀割据,干戈扰攘者达10余年”,孙中山提出的实业计划未能实施<sup>②</sup>。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其所立“遗嘱”第二段所列“务须依照”的著作中第一部就是《建国方略》<sup>③</sup>,而《建国方略》中“物质建设”部分就是《实业计划》。1927年国民党执

①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9页。

② 王尔敏:《“中华民国”开国初期之实业建国思想》,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994页。

政之后,孙中山被奉为“国父”,“国父遗教”成为治国纲领。因而,《实业计划》也被称为“中山实业计划”、“国父实业计划”、“国父遗教”、“总理遗教”,具有崇高地位,影响更加广泛。当时论述实业计划的著述很多,包括专著、报刊文章、实业报告、学习培训教材等。例如,高元宰主编发行的《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sup>①</sup>,上面所刊“中华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启示”,开篇就强调“印刷事业关系国家文化至巨,本校遵照总理实业计划中之印刷工业实际发展,现设有教育、制造、印刷、出版四大科”。《中华印刷杂志》纪念号(1936年)有一页插图,上半部刊载“孙总理遗像”,下半部刊载“总理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第五部印刷工业”的全部文字。民国时期,还有《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至1940年共出版24期)、《印刷通讯》、《造纸印刷季刊》等印刷杂志,其他杂志也发表过论述印刷工业的文章。本文重点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刷出版界专家以引证和阐释“总理遗教”的话语方式,针对印刷工业所发表的见解,由此探讨印刷工业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相互作用的关系,评价孙中山有关印刷工业的论述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深远影响。

## 一、印刷工业与文明的关系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论述印刷工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首先强调印刷与出版物、印刷与文明的关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新式印刷业的发展与新式出版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印刷与出版的概念也是相互联系的。1911年版《普通百科新大词典》这样解释“出版”概念:“为发表思想,以机械、化学等方法,刷印文书、图画而颁布也。”<sup>②</sup>由于西方印刷技术的输入,当时的印刷已经采用机械、印版或化学等方法,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印刷方式,所谓“出版”就是印刷发行的意思。因此,印刷业与出

版业是密切相关的行业。陆费逵1932年《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就说明:“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例如,商务印书馆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中华书局也占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所以,印刷业和出版业“习惯上统称书业”<sup>③</sup>。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通过对比,说明“在欧美各国出版业很少兼营印刷业,我国却不是如此。在光绪二十年左右有了新式出版业以后,规模较大的出版家没有不自办印刷所的。并且印刷业在中国简直是出版业的附属品”<sup>④</sup>。

孙中山将印刷工业列入五种物质工业之一,与衣食住行四种物质工业并列。实际上,由于印刷工业的产品是出版物——有关人类精神文明的产品,其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印刷是文明的一大因子,印刷出版物是人类知识积淀的载体,也是人类知识传播的工具,人类在解决了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后,会对精神产品有更高的需求。所以说,这是“近世社会一种需要”。而且,从横向比较来看,“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尤其令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国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曾对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这在民国时期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的著述中有充分论述<sup>⑤</sup>。然而,正像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甚迟缓”。中国的印刷工业在近代落在了世界发达国家后面,这也影响了出版物的数量和社会文化的进步。有鉴于此,孙中山强调“吾所定国际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印刷工业。若中国依予实业计划发达,则四万万人民所需印刷物必甚多”。

如果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兼及印刷工业”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那么,到了上个世纪30

① 笔者所见《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是1936年11月的“三版”,初版日期不详。据1936年2月《中华印刷杂志》纪念号的一段更正文字(“上期照相制版术专号内”),可知照相制版术专号的初版早于纪念号,可能在1934年,一说在1935年。

② 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丑集,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第64页。

③ 《申报月刊》第1卷第1号,1932年。

④ 王云五:《中国的印刷》,《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

⑤ 如《中国雕版源流考》(孙毓修,商务印书馆,1918年)、卡特《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1936年在《出版周刊》连载)、刘龙光《中国印刷术的沿革》(《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第1期、第2期)。

年代,伴随着中国出版业特别是大众化报纸、杂志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出版物有了更大需求,发展民族印刷工业也就成为具体落实“总理实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元宰在《印刷画报》创刊号(1934年)发表《改进吾国印刷的具体办法》一文,开篇就指出:“印刷的事业,是推进文化的原动力。所以总理遗嘱中,发展印刷工业的计划,说得很详细。因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拿每年出版物的多少来论断的。因此,要调查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要问印刷事业发达和不发达,就可以知道了。”高元宰又在《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上发表《华北文化印刷厂五年计划书》,强调“印刷事业,关系国家文化至巨。故总理实业计划中,对于生活之物质条件共有五种即衣食住行,及印刷是也”,在引述孙中山有关印刷工业的全部论述后,指出“印刷工业,非但个人生活之所需,而国家文明之程度,亦基于此”。

强调印刷与文明的关系,也是基于对世界近代史的考察。《近代印刷术》一书介绍了欧美20世纪以来的印刷业发展情况,指出“印刷设备之问题,应视衣食住同一重要。盖文明国家之国民,无日无时而能离印刷品也。有印刷品,虽坐斗室而可阅知世界推进之大势。故印刷品之能力,对内足以鼓励民气,发展工商业,对外足以表扬国家文化,增长国际地位”,并引述了美国印刷联合会所奉之格言——“印刷为进步之母”<sup>①</sup>。中国的印刷工业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遭到重创,发展印刷工业也成为民族振兴事业的一部分,《印刷术与文化》一文指出:“印刷术不但是科学文化的喉舌,而且也是国家民族盛衰的间接因素,反观世界各国的新奇发展,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急起直追”;“想要文化兴起,国家富强,科学昌明,工业发达,不能不著重印刷术”<sup>②</sup>。《文化先锋》杂志在抗战结束后,曾以“印刷工业与文化”为题举行征文,获得第一名的文章《从国父遗教研究印刷工业的重要性》<sup>③</sup>谈到“公众读物的普

遍”对文化的重要:“四万万万人所需的出版物,为量自然不小,要想人手一册,也就谈何容易。至今,中国的印刷工业仍没有达到发展的预期程度,影响国家文化也就很大了。”作者黄惠进一步阐释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建设运动和工业革命运动,亦即是政治社会的革命运动。国父所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归根说,也还是一种新的文化建设运动和新的工业改革运动。即进一步说,印刷工业的发展,按照文化建设的原则,也莫不与政治社会革命的大体相关”;再具体到印刷工业的环节,“据印刷的发明,辅助工业的设立,到出版物的推广,本都是属于知识范围的。我们从一件印刷品最初的产生起到最后的推行止,这一段过程,需要多少人思考、设计、编印、装订、运输、推销和阅读,而后才实收他的效果”,所以说,“印刷业就是文化建设的首要手段”。

从30年代到40年代,就印刷与文明、印刷工业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诸多文章都对“总理遗教”进行了阐释,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印刷工业亟待发展的状况,一方面也证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列入印刷工业,在民国时期的实业建设过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原因及改进措施

### (一)对中国印刷工业落后于人的反省

印刷出版界人士对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落后状况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不断针对历史与现实的反差,表达反省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奋起行动的激励因素。《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指出:“著者读我国古代印刷史,不胜崇拜我先代创造改进之精神;而一考察我国近今印刷界之状况,对于我印刷界之不知积极改进,未能与世界各国比美,又不能不深为叹息也。”<sup>④</sup>中国印刷学会的刊物《中国印刷杂志》(1936年)发刊词写到:“我们这许多幼稚的印刷技术者群,又

①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03页。

② 李常旭:《印刷术与文化》,《西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3期,第48~49页,1946年4月1日。

③ 黄惠:《从国父遗教研究印刷工业的重要性》,《文化先锋》第7卷第6、7期,1947年。

④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中国印刷术》,《中华印刷杂志》纪念号,1936年2月。

都主持着中国印刷的中心分子,中国印刷的落后,简直就是我们每个分子的羞耻!”刊物的主持者是一些把改变我国印刷技术落后面貌作为己任的有志之士<sup>①</sup>。《艺文印刷月刊》也曾发表文章,强调印刷界应该共同担负发展印刷工业的使命,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准,增进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sup>②</sup>。

## (二)对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状况的描述

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落后状况,是与当时的印刷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涉及诸多方面。《上海印刷机工业之调查》一文写到:“国家之盛,赖乎工业,工业发展,凭乎机械。我国以缺乏机械制造厂,故多项机械,多仰给于舶来品。就每年国内所用之印刷机器而论,亦几达五十万两,其他之机械,十百倍于此。年来国内印刷工厂,屈指可数。故国人尚有不知印刷机我国已能仿样制造者。”<sup>③</sup>文章列举了一些国内生产的印刷机器,但指出规模有限。《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则列出三种表格,统计中国自1911年至1929年纸张、铅印石印材料和印刷机器的进口情况,作者大发感慨:“统观上列三表,有令人不寒而栗者。历年洋纸、铅印石印材料及印刷机器输入之总额,突飞猛进,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近年印刷术量的进展,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印刷事业每年漏卮之巨。故欲谋今后吾国印刷事业正当之发达,于培植印刷人才之外,更宜努力于印刷原料之制造。”<sup>④</sup>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依赖于印刷工业。但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印刷产品,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失,也阻碍了出版业的发展。陆费逵曾统计“书业的营业,在前清末年,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近年约三千万元”。他将我国的情况与美国进行比较:“美国纽约市近年各种实业中,以印

刷出版占第二位置,年约四五万万美金,约合国币二十万万元。美国系联邦制,各邦各有其教育制度,工商业又发达,所以纽约不能为全国集中之地,至多占全国五分之一。然则美国全国的印刷出版每年有一百万万元了,我国人口四倍于美国,应该每年有四百万万元,今尚不到三千万元,不及千分之一,岂不可叹!反过来说,便是前途发展的希望,却非常之大。”通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印刷业出版业,现在确实太幼稚了!我国的印刷业出版业,前途还有一千倍以上的发展。我们要努力!”<sup>⑤</sup>1933年的《近代中国实业通志》第十九章印刷业部分也记载:“今吾国之印刷界,较之光绪年间,其机械能力,已增加至十倍,较之民国初年,亦已增加五倍。然美之纽约印刷业,占全埠工业第二位置,每年营业达四万万美金,以视上海,印刷业每岁不过三四千万元,其相去霄壤为何如。且现时印刷所用之油墨纸张及印刷机械,大半来自欧美,输出金钱尚无补救漏卮方法,亦不可不注意及之。”<sup>⑥</sup>印刷专家高元宰非常痛心指出:“你看每年海关贸易,印刷机械,印刷用纸,印刷油墨,印刷药品等,每年总在百万万元以上。”<sup>⑦</sup>

通过这些有关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状况的具体数字,反过来看孙中山从民生主义出发,提出发展印刷工业及其辅助工业,确实是深谋远虑的计划;而印刷界人士对“总理遗教”的阐释也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

## (三)提出发展印刷工业的具体措施

### 1. 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印刷人才。

孙中山1919年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就谈到了培养专门科学人才的问题<sup>⑧</sup>。而发展印刷工业,培养印刷人才,其途径之一就是开展职业教育。高元宰在《印刷画报》创刊

① 姜信之:《我国三十年代印刷史料片断》,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装订源流和补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

② 黄鸿铨:《中国印刷界应有之使命》,《艺文印刷月刊》第1卷第8期,1937年。

③ 《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21~24期,1929年。

④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中国印刷术》,《中华印刷杂志》纪念号,1936年2月。

⑤ 《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

⑥ 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通志》,上海:中国日报印刷所印刷,1933年,第338页。

⑦ 高元宰:《日本“照相凹版印刷业”纪要》,原载1934年《印刷画报》创刊号,见《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附录。

⑧ 《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页。

号(1934年)“发刊小言”中感慨:中国的印刷技术“尤其是恐慌到极点了。所以弄到最先发明印刷的国家,大有‘每况愈下’的情势,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印刷的智识。印刷的智识是从那里来的呢?无非是一种在学校里得来的,一种是从书籍上得来的。中国关于这两种都没有……所以总理对于发展印刷工业的计划,很是详细”。他说自己在法国学习时,就“抱定这个宗旨,愿意牺牲吾个人的一切,来作‘印刷教育’的开路先锋”。他在同期发表的《改进吾国印刷的具体办法》一文中指出,中国印刷事业不发达、技术落伍,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印刷教育’的缘故”。而职业教育“是要把关于印刷上的学理和技术,灌输到一辈从事于印刷工作的人们,或者培植印刷专门人才”。具体的改进办法包括举行印刷学术演讲会,开办印刷补习学校,在原有各大学中添设印刷学系,设立国立印刷专科学校、印刷学术研究院,开办印刷工业工厂,组织中国印刷学会等,实际上就是根本改变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将印刷作为科学技术来研究。1933年4月起,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高元宰负责,举行印刷学术演讲会,“聘请国内外印刷专家,担任演讲,共计十一次,听讲者共计一千余次”<sup>①</sup>。在此基础上,高元宰等人商议成立了中国印刷学会,希望把国内印刷人才集中起来,共同改进中国的印刷学术<sup>②</sup>。

发展印刷职业教育,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近代印刷术》一书详细介绍了欧美的情况,特别指出“美国以一新起之国家,而于印刷工业之发展,独驾于其他各国之上者,莫不归功于训练与研究之设施”,还列出了“美国印刷教育之统计(1930年)”表<sup>③</sup>。《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第1期也详细介绍了美国卡乃基工学院印刷系的情况。而《中华印刷杂志》是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的刊物,其在1936年“照相制版术专号”所刊登的学校启事,就说明

“印刷技术之高下,全视印刷教育之有无为标准,吾国印刷技术之落伍,全由于缺乏印刷教育,有以致之,故本校先办函授部,使全国印刷界,明了印刷教育之重要,以后当办专科学校,培植印刷专门技术人材”。学校的师资不乏有留学背景的人士,高元宰(法国国立美术学院毕业,法国国立工艺大学影印师)担任函授学校的校长,负责“将历年之经验与学术”制成各项机械、编译印刷学术书籍及印刷杂志,介绍近世制版印刷技术;高维祥(德国国立工科大学摄影院毕业)、朗鲁逊(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毕业)等人也通过文章或讲课,介绍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高元宰还发表了《教育部嘱托编订初级印刷职业学校之职业学科及设备标准》,征求专家的意见。1941年,还有文章论述“欲实行总理遗教,当先设立印刷教育机关,培植印刷完全人才”,并提出“技工学生化、学生技工化”的措施<sup>④</sup>。

## 2. 建立印刷工厂,改变依赖进口的情况。

孙中山根据中国的情况,在《实业计划》中提出“须于一切大城乡中设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自报纸以至百科全书”。以印刷机器对报纸的作用为例,当时有文章写道:“报纸一类的东西,总要人人都有阅览的机会,才可使文化广播,美国支加哥日报每日行销百万份以上,那种传达消息的能力,是如何的伟大?报纸的行销虽是那样多,然而在印刷时,用一种伟大机器,在数小时内,从容印出,毫不费力,这不是印刷进步的功绩么?”<sup>⑤</sup>

高元宰曾留学法国,并到过日本考察,他实际了解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对孙中山的论述有更深刻体会。他曾写到:“考察日本‘照相凹版’印刷事业后,感慨丛生,叹吾国之事事落人之后。以世界首先发明印刷业之吾国,反而落伍若是!机械、油墨、纸张,近虽有数家制造,但应用狭小,高级之印刷,舍外国货莫能举办。回顾日本印刷事业之发达,以及印机、油墨、纸张,

① 《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印刷学术演讲会追记》,《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1936年11月三版。

② 元:《中国印刷学会发起的经过》,《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1936年11月三版。

③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第39页、41页。

④ 黄怀英:《如何培养印刷工业的完全人才》,《造纸印刷季刊》第1期,1941年。

⑤ 《印刷术与文化》(作者不详),《兄弟国货月报》第1卷第2期,1934年。

莫不有一日千里之势,不数年后,直将与欧美相颉抗矣。夫一国之强盛,胥视国内之文化,是否昌明!而文化之昌明,则全赖印刷事业之发达也。故总理遗教中,关于提倡印刷事业,亦为实业中之一项,深望全国人士竭力提倡,于大小都邑中,次第设立印刷工厂,则数十年后,吾国文化,昌明既可预卜,国势或有强盛之望,不致终见侮于人也。”<sup>①</sup>高元宰在1932年曾受河南督办的委托,具体设计了《华北文化印刷厂五年计划书》<sup>②</sup>。

### 3. 举办印刷展览,了解世界先进技术。

上海是当时中国印刷工业的中心,但是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大城市相比,在印刷工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的距离。

1934年2月,中德文化协会、世界文化合作会以及中国国际图书馆三家机构合作,在上海举办“现代德国印刷展览会”。为此,《印刷画报》创刊号编辑了“现代德国印刷展览会特刊”,详细记录展览会开幕的情况、展览会书籍种类等信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致辞中称赞德国兰堡“不仅是德国的书业中心,且是欧洲印刷事业的中心”,他由此反观我国印刷事业,“虽则发明极早,惟以不谋改进,沿用旧法,一致迄于今日,犹只刻板及聚珍版见长,他无足述”。他寄希望于上海,“中国之兰堡,乃为上海,故此展览沪上,于吾国文化事业前途,更有莫大关系”。中央研究院委员李石曾在致辞中表示,“印刷乃为文化之基础,足以表现人类之思想者,人类之精神亦寄而附之,故此番陈列于海上,不仅对我国文化有所贡献,且于全世界,全历史,亦有莫大关系,其意义尤为深远焉”。

这次展览对专家学者产生很大刺激。图书馆界专家袁同礼通过《现代德国印刷展目录序文》,介绍了欧洲印刷术的发展,感慨地写到:“印刷发明最早之东方古国,至今反声光日坠,以视其先人,且犹不逮,宁不大可哀乎,此所以有现代德国印刷展览会之举,国人览此,庶几足以发思古之幽情,启愤悱于未来耳。”印刷专家高元宰在《参观现代德国印刷展览会感言》中

写到:“各国印刷界莫不有德国印刷机之应用,且能利用印刷技术之精良,故有今日之成绩。回顾吾国,墨守旧法,一无改良。机械、纸张、油墨等,莫不仰给于外人,而技术之恐慌,已成为事实。首先发明印刷之吾国,一至于此,良可感叹。深望当轴,极力提倡,技术专家,从速合作,则吾国印刷界,或有一线曙光也。”

## 三、“总理遗教” 对印刷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有关印刷工业的论述,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以“总理遗教”的话语方式,被专家学者从多方面加以阐释。印刷界专家也从专业角度,考察了西方印刷工业的先进技术,描述了中国印刷工业的发展状况。这都足以说明孙中山有关论述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在新媒介迅猛发展的当今,回顾这段历史及其文献资料,对印刷文化的研究也有启示意义。

### (一)从印刷工业看出版物的文化价值

中国近代印刷业经历了从传统的手工印刷术向西方的现代机械印刷技术转型的过程,这也带来了中国出版物类型(从图书到报纸、杂志、画报、广告等)的变化,以及编辑方式和出版模式的变革。换个角度看,由于西学图书的传入,西方的印刷机器也被连带输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各种印刷媒体迅猛发展,人们对印刷出版物的需求不可遏制,这反而凸显了中国印刷工业依赖进口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促使社会有识之士及印刷界专家认清中国印刷业的落后状况,努力肩负起发展民族印刷工业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近代的出版发展与印刷技术的引入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与中国古代印刷技术与传统文化相适应而缓慢发展的状况是不同的。

研究中国近代的编辑出版史,一般会从理念上强调编辑者的社会责任、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而印刷界专家则从技术角度,说明了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实际状况,由于印

① 高元宰:《日本“照相凹版印刷业”纪要》,原载1934年《印刷画报》创刊号,见《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附录。

② 《中华印刷杂志》照相制版术专号,1936年11月三版。

刷机器、纸张、油墨等依赖进口,增加了出版物的印刷成本,导致书价昂贵,不利于出版物的发行和文化知识的普及,这也有力地论证了孙中山所说的“产出印刷工业所需诸物”的重要性。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事业,不能只是泛泛提及印刷技术,还应该从整个印刷工业的角度,思考印刷出版物与社会文化、经济效益的关系。上海是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中心,也是出版文化的重镇,但与当时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大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也影响了上海出版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横向比较,“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来综合评价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所谓“出版物”既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具有生产成本的物质产品。

## (二)从书籍史、媒介史视角看“印刷术”的作用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谈到:“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甚迟缓。”从世界印刷史来看,这涉及中国古代所发明的印刷术及其影响,以及中国在近代印刷工业中的地位等问题。简单说,印刷术或者印刷机器本身以及印刷工业的发展,作为传播媒介,究竟对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具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不妨借鉴西方书籍史、媒介史研究的视角来认识这个问题。

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印刷书的诞生》第八章将印刷术视为变革的推手,“试图厘清,新的印刷技术究竟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划时代变局里扮演何种角色”。由于书籍是商品,印制书籍要考虑成本和营利,那些“最能替出版商赚钱”的宗教、文学、教材等类型的书籍得以大量复制,成为畅销书。“这也就是说,印刷术的问世,其实可以看成人类迈向大宗消费与标准化的现代社会之前,一度经历的阶段。”<sup>①</sup>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但在古登堡发明机械印刷技术之后,反而落后了。对其原因,有外国学者对比欧洲的情况认为:“虽然印刷术最初

是在中国发明的(可能在欧洲之前500年),但它之所以不曾在那里产生重大的——更不用说革命性的——影响,正是因为那里没有资本主义。”<sup>②</sup>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着西方传教士将出版物以及机械印刷技术带入中国,中国的传统印刷技术逐渐被现代印刷工业所取代。一方面中国出版业迅速发展、读者市场不断扩大,一方面印刷工业依赖进口,造成印刷品成本过高而经济损失巨大。可以说,在世界印刷工业的竞争中,中国已经明显落伍。《书籍的历史》一书介绍“19世纪:工业时代”时,详细描述了当时印刷工业的革新及其对出版业的影响,并认为“19世纪以及直至1914年大战前的时代是书籍胜利的时代”<sup>③</sup>。参照此书所介绍的西方印刷工业的发展状况,可以证明孙中山在1916年撰写《实业计划》时“兼及印刷工业”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提出要发展民族印刷工业及其辅助工业,“须于一切大城乡中设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自报纸以至百科全书。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售出,以应中国公众之所需”,这充分考虑到图书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以及出版物作为物质产品的制作成本因素。我们由此获得启发: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业,考察图书出版的种类(翻印古籍、翻译西学书籍、编辑教材等)、大众报刊的流行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不能忽视印刷工业的因素。或者说“印刷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出版文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民国学者在介绍近代印刷术时,就已经认识到“近代不能不注重插图及着色之出品。若新闻纸杂志之属,其行销数目,动以数十万至百余万计,而篇幅又以广告居多,广告复以图式为上,文字为次。此印刷关系文化者,至深且切也”<sup>④</sup>。印刷专家高维祥在《中华印刷杂志》上曾专门解答“关于影印卷帙极多而印数有限之方法”,也就是影印古籍的成本和技术改进问题。

① [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262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③ [美]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9页。

④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第102页。

媒介环境学派关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传播媒介本身的作用及其演变过程,印刷媒介是其中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代表性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认为印刷史掀起的传播革命对近现代的欧洲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①</sup>,并以具体史料比较和研究了从手抄书文化到印刷术文化的转变及其在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与古代印刷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同,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已经是世界印刷工业的一部分。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文化演变过程中,印刷技术本身作为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从手抄或雕版印刷的官方京报,到机械印刷批量发行的大众化日报,报纸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的传播秩序和信息流动产生深刻影响。当时的印刷专家基于对民族印刷工业落后状况的了解,反而更能理解印刷出版物对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作用,因而,他们对“总理遗教”反复引用和阐释绝不是一种套话。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出版的印刷专业杂志也是研究印刷文化的重要史料。

### (三)从历史视野看当代媒介的特征及其影响

从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从手抄本到印刷本的变化,其实也是出版物复制方式的变革。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复制阶段。媒介环境学派将所有的媒介放在一起研究,比较不同的媒介本身具有什么特征,新媒体与旧媒介的关系,以及新媒体改变了旧媒介的哪些方面,并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强调印刷文化对人类文化的特殊贡献以及对当今媒介环境所具有的平衡作用。因而,历史上的媒介变革时期是考察当今媒介变革的“后视镜”,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然而,正像《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所指出的:“印刷品积累得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倾向于忽视其影响,就越容易

重视不太熟悉的媒介。于是,思考电视效应的文章自然比猜想印刷术影响的文章更具有广阔的市场。因为后者的影响越来越不引人注目,所以虽然印刷术的反响当前还在日益放大,但奇怪的是人们却以为其影响正在日益减弱。”<sup>②</sup>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回过头去,考察中国近代的媒介史。这是一个新旧媒介交替的重要时期,“印刷术”(印刷机、印刷工艺、印刷工业、印刷媒介)所涵盖的内容相当丰富,其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传统的印刷工业及其出版物受到了新媒介技术的挑战,各种电子出版物在物质载体、电子纸墨、显示终端等方面不断改进技术,出版业已经成为整个数字产业和文化产业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导致出版物在文本内容、编辑方式、复制传播、阅读接受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认识数字产业相对印刷工业而言所具有的媒介特征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如何从全球视野考察中国在新媒介技术方面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如何在衣食住行之外,从物质层面考虑降低成本、满足人们对多种出版物的消费需求?如何发展出版专业教育,培养适应数字出版需要的人才?孙中山对印刷工业的深刻见解以及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对印刷文化的阐释,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便提出《实业计划》,并将印刷工业作为五种物质工业之一。如今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中国的媒介历史也有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和比较的基础。梳理当年在“国父遗教”语境下印刷界专家的学术见解,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近代印刷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这对世界印刷媒介史也有比较和参照的价值。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将印刷史与出版史、文化史、媒介史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媒介演进与文化变迁的规律,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现实、把握未来。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②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第10页。